

《资治通鉴》二十讲

刘后滨 李晓菊 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刘后滨 李晓菊 主编

韩树峰 李全德 李晓菊

刘后滨 刘新光 皮庆生

编

王静 杨梅 张忠炜

《资治通鉴》二十讲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资治通鉴》二十讲/刘后滨, 李晓菊主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ISBN 978-7-300-12533-6

- I. ①资…
II. ①刘…②李…
III. ①中国-古代史-编年体-普及读物
IV. ①K204.3-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44750 号

《资治通鉴》二十讲

刘后滨 李晓菊 主编
Zizhitongjian Ershi Jiang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80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70 mm×24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印 张	19.75 插页 2	印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15 000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编写说明

本书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承担的通识教育大讲堂课程《资治通鉴选讲》的试用教材，由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和历史文献学专业教师集体编写。学校领导和教务处负责同志对课程建设和教材编写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孙家洲、包伟民、李小树等教授提出了编写和修改意见。

历史学在大学通识教育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资治通鉴》作为中国传统史学最具代表性的经典史著之一，不仅是大学通识教育的最佳读本，也是各界人士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吸取历史智慧的重要津梁。本书选编了《资治通鉴》有关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记载，旨在普及历史知识的同时，通过对原典的研习与思考，使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文献阅读能力得到切实的训练与提高。

本书作为一部通识教育教材，已经连续五个学期在中国人民大学开设的《资治通鉴选讲》的数十个课堂上试用。针对教学中遇到的问题以及选课学生对教材内容及授课方式的反馈意见，我们进行了多次大幅度的修订，努力适应通识教育课程的特点，满足非历史专业读者阅读中国古代经典史著的需求。

本书在编写体例上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选文尽量做到内容完整、主题突出。在选文的技术处理上，我们尽量以段落而不以句子为单位对原书材料进行剪裁，以保持历史事件叙述的完整性。全部选文以中华书局点校本为依据，个别断句和标点根据选编者的理解作了不同的处理；文字校勘方面，选文充分吸收了点校本所附章钰校记的成果，限于体例的原因，这些文字上的处理，在选文中未能一一注出，统此说明。

二、设主题单元以统摄选文。全书除前三讲带有绪论的性质外，其余选文部分则分设八个主题单元加以选录，即开国与创制、君道与政体、选官与用人、士人与政治、变法与改革、战争与兵谋、边疆与民族、衰政与亡国，这些专题的拟立，是基于我们对《资治通鉴》所载内容的理解而作的分类，大致涵盖了中国古代治国实践的各个方面。每一个单元都有一篇综论性质的解题，体现选编者对中国古代历史重大问题的基本理解，并提出一些值得进一步思考的学术命题。

三、注释兼顾学术性与普及性。本书的阅读对象为高中以上到大学本科程度的读者，为了帮助读者解决由词语和专业知识的阅读障碍，本书对选文提供了较为详备的注释，内容包括专有名词、词语、人物、典制等，注文的撰写在辅助阅读的同时，也注意专业知识的介绍，具有相当的学术性。本书对历史地名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注释，地名标注凡例如下：

1. 历史地名标注均以史为乐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为底本，参校包括《资治通鉴》胡注在内的其他文献。

2. 今地名一律以《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为准，反映的是1994年12月底的行政区划。

3. 选文未交待政区通名者，先注通名，再注治所及今地。政区通名存疑者不出注。

四、通过“讲评”和“延伸阅读”，为读者提供史学界的前沿成果。在每一篇选文之后，都附有“讲评”，交代选文意旨，概括选文内容，梳理历史线索，揭示史籍要义。“讲评”尽量从多元视角揭示出选文在古代政治史、思想史、历史编纂学、史料学上的意义与价值，画龙点睛，举一反三，充分显示历史学的专业风格，以区别于一般的文选。当然，我们也在适当的地方，对《资治通鉴》的历史写作艺术进行文章赏析方面的点评。“延伸阅读”中精选了与选文内容密切相关的论著，包括高质量的学术专著、论文、教材和普及读物，既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选文，也可以帮助读者根据需要进一步拓展阅读。

五、通过“思问录”来沟通历史与现实。与一般的教材有所不同，本书的“思问录”或与“讲评”文字相呼应，或由“讲评”内容引申开去，不仅着重于帮助学生掌握课堂教学的内容，更致力于帮助读者在理解选文的基础上，深入思考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大问题，在“知人论世”方面有

所启沃。

选编《资治通鉴》是文史学界一项具有深厚传统的工作，前人已有多种优秀的选本。这部教材的编写，努力吸取了以往诸多选本的思想精华，编选体例上亦多有借鉴，对当今非史学专业读者对中国历史所关注的话题和阅读习惯也给予了一定的关照。尽管我们已经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一定还存在不足，需要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完善，欢迎读者提出意见和建议。

本书由刘后滨、李晓菊主编，刘新光负责地名的注释和配图，杨梅、张雨进行文稿汇总，历史系研究生意如、顾成瑞校对了部分文稿。本书编写的具体分工如下：

李晓菊——第一讲、第二讲、第十四讲

李全德——第三讲、第二十讲

张忠炜——第四讲、第十讲、第十六讲

韩树峰——第五讲、第九讲、第十二讲

杨 梅——第六讲、第八讲

刘后滨——第七讲、第十五讲、第十九讲

皮庆生——第十一讲、第十八讲

王 静——第十三讲、第十七讲

目 录

序表与史论

第一讲 司马光与《资治通鉴》/ 3

第二讲 《资治通鉴》重要序表/ 25

第三讲 《资治通鉴》重要史论/ 37

开国与创制

第四讲 秦始皇帝/ 55

第五讲 东晋建国/ 72

君道与政体

第六讲 轮台罪己诏/ 89

第七讲 贞观君臣论治/ 100

选官与用人

第八讲 汉武帝用人/ 117

第九讲 曹魏选官/ 131

士人与政治

第十讲 党锢之祸/ 145

第十一讲 长乐老冯道/ 158

变法与改革

第十二讲 孝文帝改革/ 175

第十三讲 刘晏理财与杨炎行两税/ 189

战争与兵谋

第十四讲 肥水之战/ 201

第十五讲 魏博归朝/ 217

边疆与民族

第十六讲 张骞通西域/ 231

第十七讲 安禄山起兵/ 242

第十八讲 契丹灭后晋/ 257

衰政与亡国

第十九讲 隋炀帝急政/279

第二十讲 朱温代唐/291

序表与史论

论史者有二弊焉：放于道而非道之中，依于法而非法之审，褒其所不待褒，而君子不以为荣，贬其所不胜贬，而奸邪顾以为笑，此既浅中无当之失矣；乃其为弊，尚无伤于教、无贼于民也。抑有纤曲嵬琐之说出焉，谋尚其诈，谏尚其譎，徼功而行险，干誉而违道，奖谗随为中庸，夸偷生为明哲，以挑达摇人之精爽而使浮，以机巧裂人之名义而使枉；此其于世教与民生也，灾愈于洪水，恶烈于猛兽矣。

盖尝论之：史之为书，见诸行事之征也。则必推之而可行，战而克，守而固，行法而民以为便，进谏而君听以从，无取于似仁似义之浮谈，祇以致悔吝而无成者也。则智有所尚，谋有所详，人情有所必近，时势有所必因，以成与得为期，而败与失为戒，所固然矣。

——王夫之《读通鉴论·叙论三》

第一讲

司马光与《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

北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十月十八日（公历11月17日），司马光生于河南光山。他的父亲，新任光山县令司马池为他取名光。成年后，取字君实，自号迂夫，晚年号迂叟。因祖籍陕州夏县（治今山西夏县）涑水乡，后人尊称“涑水先生”。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司马光68岁，在宰相任上去世，朝廷赠爵号“温国公”，谥号为“文正”，故后世尊称“司马温公”或“司马文正公”。



司马光像

司马光自幼喜爱历史，7岁时，在家塾听讲《左传》，发生浓厚兴味，回家

后能复述大意。青少年时期的司马光刻苦力学，终日读书，手不释卷，在熟读的基础上，体会思考其中的道理，他说：“书不可不成诵，或在马上，或在中夜不寝时，咏其文，思其义，所得多矣。”^①

仁宗宝元元年（1038），司马光20岁，中进士甲科，以奉礼郎任华州（治郑县，今陕西华县）判官。不久，父亲调任杭州，司马光亦申请改签苏州判官事，就近照顾双亲。康定元年（1040）宋与西夏战事又起，朝廷准备在两浙路添置弓手，司马光代父拟写了《论两浙不宜添置弓手状》。

康定元年到庆历元年（1041），司马光的母亲和父亲相继去世，他连续服丧五年，不任官职。在此期间，他潜心读书，深入思考，撰写了《十哲论》、《四豪论》、《贾生论》等很多不拘成说、具有独立见解的史论文章。

庆历四年，司马光服丧期满，任签书武成军（治滑州，今河南滑县东南八里城关镇）判官，改宣德郎，匠作监主簿，权知滑州韦城县令。公余时间继续阅读经史，撰写了《机权论》、《才德论》、《廉颇论》、《不以卑临尊议》、《河间献王赞》以及十几篇史评文字，其中很多议论成为后来《资治通鉴》史论的基础。

庆历六年，司马光奉调进京，自大理评事，迁大理寺丞，为国子监直讲。

皇祐元年（1049），为馆阁校勘，校勘注释古文《孝经》，又与同僚一起上书，请求校勘印行《荀子》和扬雄《法言》。先秦的荀子和西汉的扬雄是司马光一生推重的大儒，他本人曾经注释过扬雄的《太玄》和《法言》。

皇祐三年，迁殿中丞，除史馆检讨，修日历，再改为集贤校理。皇祐五年，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庞籍罢知郢州（治须城县，今山东东平县），应庞籍之邀，司马光任郢州通判，兼典州学事，后庞籍为昭德军节度使、知并州（治阳曲县，今山西太原市），辟光为并州通判。

嘉祐元年（1056）春，宋仁宗发病，数月不能听朝。仁宗无子，皇位继承问题令人担忧。知谏院范镇首先上书，建议选立皇储，时任并州通判的司马光也连上三书，请仁宗早建皇储，以安天下。

嘉祐二年，司马光再次入朝，为太常博士、祠部员外郎、直秘阁、判吏部南曹，作《功名论》、《知人论》。嘉祐三年，迁开封府推官，当时的知府为欧阳修。欧阳修多年前写过《朋党论》，司马光在这一年也写了一篇《朋党论》。

^① 顾栋高：《司马光年谱》卷1引《家塾记》，28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

嘉祐四年，迁度支员外郎，仍直秘阁，判管勾院，又受命修起居注。嘉祐六年，迁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开始了他一生政治活动中最积极有为的谏官生涯。

在宋代，谏院与御史台合称“台谏”，它们的职责是：“纠察官邪，肃正纲纪”；“规谏讽喻”，“凡朝政阙失，大臣至百官任非其人，三省至百司事有违失，皆得谏正”^①。宋代台谏制度在仁宗时期得到很大的发展，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司马光以强烈的政治责任心就任谏官之职，刚一上任，就连上数篇奏札，论“君德”，论“致治之道”，论“养兵之术，务精不务多”，又进“五规”，从“保业”、“惜时”、“远谋”、“重微”、“务实”五个方面向皇帝阐明当前为政的要务。^②三个月后，再次就皇位继承问题奏请仁宗定立储嗣。^③嘉祐元年，仁宗发病时，虽然有包括司马光在内的很多官员建议立储，但仁宗无意为之，没有采纳。五年过去了，皇位继承人一事仍无着落。司马光此次郑重地对仁宗说，这个问题如果再不及时解决，就有可能出现唐朝那样的“定策国老”、“门生天子”之祸。^④仁宗听了，大受震动，下令将司马光的奏札“送中书”^⑤。司马光随即赶去对宰相韩琦等人说：“诸公不及今定义，异日禁中夜半出寸纸，以某人为嗣，则天下莫敢违。”韩琦等人拱手说：“敢不尽力！”^⑥于是，仁宗立侄儿赵宗实为皇子（即宋英宗，即位后改名赵曙），皇位继承人问题终于得到妥善解决。司马光在仁宗建储这个大事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欧阳修说他有功国，可谓“社稷之臣”^⑦。

嘉祐七年，朝廷擢升司马光为知制诰，掌中书词命，他以自己不善作四六骈体之文，坚辞不受，继续担任谏官，一直到英宗治平二年（1065）。在长达5年的谏官生涯中，司马光尽忠尽职，直谏敢言，针对科举取士、官吏考核、国

① 《宋史》卷164《职官志四》，12册，386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宋史》卷161《职官志一》，12册，3778页。

② 参见顾栋高：《司马光年谱》卷2，54～55页；司马光：《传家集》卷20《陈三德上殿札子》、《言御臣上殿札子》、《言拣兵上殿札子》，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下同），1094册，207～211页，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同书卷21《进五规状》，215～221页。

③ 参见司马光：《传家集》卷22《乞建储上殿札子》，1094册，224页。

④ 事见《旧唐书》卷184《宦者·杨复恭传》，15册，4775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资治通鉴》卷259《唐纪》七五亦有记载，北京，中华书局，18册，8457页。参见本书第三讲的《论宦官专权》一篇相关注释。

⑤ 中书：即“中书门下”，为宰相裁决政务之所。

⑥ 《宋史》卷336《司马光传》，31册，10759页。

⑦ 《欧阳修全集》卷114《荐司马光札子》，4册，1730页，北京，中华书局，2001。

家钱粮、军队冗员、宫廷宴饮赏赐过当等许多现实问题以及朝廷的人事任命进行批评谏正，真可谓“久司谏诤，说言嘉话，著在两朝”^①。英宗治平二年，司马光擢升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为皇帝讲读经史，不再担任谏官。

自仁宗嘉祐年间以来，司马光就已经有了编纂一部编年体通史的宏大计划。据刘恕说：

嘉祐中，公尝谓恕曰：“《春秋》之后，迄今千余年，《史记》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诸生历年莫能竟其篇第，毕世不暇举其大略，厌烦趋易，行将泯绝。予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魏、赵为诸侯，下迄五代，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网罗众说，成一家书。”^②

治平元年，司马光首先向英宗进呈了一部5卷本的《历年图》，该书用大事年表的形式，扼要记载从战国一直到五代治乱兴衰的事迹，在此基础上着手编撰编年体通史《通志》。

治平三年四月，司马光将完成的《通志》8卷——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尽秦二世三年（前207）——进呈给英宗。在进书表中，他提到自己“少好史学，病其烦冗，常欲删取其要，为编年一书，力薄道悠，久而未就”^③。英宗看后，随即于当月下诏，命司马光于崇文院设立书局，自行选用协修人员，接续《通志》，编纂历代君臣事迹；准许使用三馆（昭文、集贤、史馆）、秘阁所有皇家藏书，笔墨文具费用由皇帝赐予。^④

治平四年，英宗去世，神宗即位，擢司马光为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权御史中丞。十月，司马光初赴经筵，为神宗进读《资治通鉴》^⑤，神宗面赐手书御制序文，命书成之日写入。司马光拜受后，读《三家为诸侯论》，神宗“称美久之”^⑥。根据神宗御旨，司马光所编这部大书定名为《资治通鉴》。

北宋中期，各种社会矛盾日益严重。官僚富户占田无限，“三冗”（冗军、冗官、冗费）导致财政危机，人民负担加重，被迫起义反抗，使国家陷入内忧外患的严重局面中。仁宗庆历年间，范仲淹等人主持“庆历新政”，裁减冗官，整顿

① 《欧阳修全集》卷114《荐司马光札子》，4册，1730页。

② 刘恕：《通鉴外纪》后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312册，659页。

③ 司马光：《传家集》卷17《进〈通志〉表》，1094册，176页。

④ 参见司马光：《进书表》。

⑤ 在此之前，司马光已奉圣旨“令读《资治通鉴》”，并且已在奏札中，称自己所修之书为“资治通鉴”，见司马光：《传家集》卷41《乞免翰林学士札子》（治平四年十月二日上），1094册，384页。

⑥ 顾栋高：《司马光年谱》卷4引《温公日录》，120页。

吏治，结果遭到强烈反对，被迫取消。治平四年，神宗即位后，决心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任用王安石主持变法^①，以图实现富国强兵。司马光对变法持反对意见，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也”。王安石变法的首要目的是要增加政府收入，扭转财政危机，他提出“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②，通过发展生产、抑制兼并、设立法度来富国利民，所谓“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司马光却认为“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③。两人既已产生了严重的政治分歧，道不同不相为谋，最后，司马光决意离开朝廷，在西京洛阳任一个闲职，编写《资治通鉴》。

熙宁三年（1070）九月，司马光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集贤殿修撰出知永兴军（治京兆府，今陕西西安市），熙宁四年，判西京留司御史台，来到洛阳，熙宁六年，改任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④，继续住在洛阳，前后15年，始终以书局自随，专心撰写《资治通鉴》。

自英宗治平三年四月置局修书，司马光每修完一代史，即向皇帝进呈。到熙宁三年出知永兴军时，已经完成了周、秦、汉、魏四代历史；熙宁四年，到洛阳以后，继续撰写由晋到后周十二代历史，到神宗元丰七年（1084）十一月，终于完成全书的编纂，前后历时19年；如果加上《通志》写作的几年，则《资治通鉴》的编纂时间在20年以上。《资治通鉴》全书294卷，上起战国，下迄五代，囊括1362年的历史；以朝代纪，共16纪，即《周纪》5卷，《秦纪》3卷，《汉纪》60卷，《魏纪》10卷，《晋纪》40卷，《宋纪》16卷，《齐纪》10卷，《梁纪》22卷，《陈纪》10卷，《隋纪》8卷，《唐纪》81卷，《后梁纪》6卷，《后唐纪》8卷，《后晋纪》6卷，《后汉纪》4卷，《后周纪》5卷。与《资治通鉴》一同进呈的还有《资治通鉴目录》30卷，《资治通鉴考异》30卷，加在一起总计354卷。宋神宗看了新修完成的《资治通鉴》后盛赞说：“前代未尝有此书，过荀悦《汉纪》远矣。”^⑤

元丰八年三月，神宗去世，宋哲宗年少即位，太皇太后高氏临朝听政。司马光以新法反对派领袖被召拜为门下侍郎，元祐元年（1086），拜尚书左仆射兼

① 王安石于嘉祐三年（1058）任三司度支判官时，曾向仁宗上万言《言事书》，主张培养人才，变法革新，未被采纳。

② 《临川先生文集》卷39《上仁宗皇帝言事书》，417页，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

③ 《宋史》卷336《司马光传》，31册，10764页。

④ 提举嵩山崇福宫，属于宋代的一种祠禄官，坐享俸禄而无实职。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50，8390页，14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

门下侍郎，主政期间，尽废新法。元祐元年九月，病逝。

《宋史·司马光传》说他“于学无所不通”。《宋史·艺文志》著录司马光著作达37种^①，清代《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其《温公易说》、《书仪》、《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目录》、《资治通鉴考异》、《稽古录》、《家范》、《法言集注》、《潜虚》、《涑水纪闻》、《传家集》等著作十余种，四百余卷，至今流传。

司马光政治思想的核心是儒家的尊君和礼治，认为礼所规定的君尊臣卑，是天经地义，亘古不变的；礼所规定的纲常名分、人伦秩序是国家政治的根本法则；在这一秩序中处于绝对核心地位的君主，是国家治乱兴衰的关键。他说：“天生烝民，其势不能自治，必相与戴君以治之，苟能禁暴除害以保全其生，赏善罚恶使不至于乱，斯可谓之君矣。”^②又说：“治乱安危存亡之本源，皆在人君之心。”^③在给皇帝的上书中，他反复提到人君的“修心之要”（又称“人君之德”）有三：仁、明、武，即仁政、明辨、果断；“治国之要”（又称“致治之道”）有三：官人、信赏、必罚，即其所谓“六言”。他说：“臣获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献，平生力学所得，尽在此矣。”^④在司马光看来，只要君主明辨是非，用心公正，仁政爱民，就能够做到选贤举能，信赏必罚，最终达到致治的目的。反之，在论述历史上的弊政败端时，他也总是把根本的原因追究到君主身上。如所作《朋党论》认为朋党固然害政误国，但朋党产生的根源不在于朝臣和士人，而在于国君，在于国君是否是非分明，用心公正，这个思想后来在《资治通鉴·唐纪》中，又得到进一步的阐发。^⑤

同样，他认为宦官、外戚干政局面的形成，也与人君有直接的关系，君主对此尤应保持高度警惕。皇祐二年（1050），入内都知、宦官头子麦允言死，仁宗破例赠他司徒、安武节度使，给一品卤簿。司马光立即上书说，名器不可以轻假人，对历史上的宦官之祸当深以为戒。^⑥在担任谏官期间，他曾严厉弹劾宦官任守忠，又上《论臣僚上殿屏人札子》，认为臣僚上殿奏事，内臣（宦官）不当侍立，以免泄露机密。^⑦后来又在《资治通鉴·唐纪》中，针对唐代宦官专

① 参见陈光崇：《通鉴新论》，18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

② 《资治通鉴》卷69《魏纪》一，5册，2185页。

③ 司马光：《传家集》卷46《进修心治国之要札子状》，1094册，429页。

④ 《宋史》卷336《司马光传》，31册，10762页；司马光：《传家集》卷46《进修心治国之要札子状》，1094册，429页。

⑤ 参见《资治通鉴》卷245《唐纪》六一，17册，7899页。

⑥ 参见司马光：《传家集》卷18《论麦允言给卤簿状》，1094册，193页。

⑦ 参见司马光：《传家集》卷22《论臣僚上殿屏人札子》，1094册，225~226页。

权，特意写了一段很长的“臣光曰”，深刻分析历史上的宦官之祸。^①

麦允言事件不久，仁宗又给外戚张尧佐连加五个官职，位同宰相。知谏院包拯等七位谏官率先上书反对，司马光也上书论之，言辞激烈。仁宗被迫“诏后妃之家，毋得除二府职位”^②。

司马光认为人有善恶贤愚，君主也不例外，所以君主需要学习，需要谏正，需要知过必改，存善去恶，这是他特别重视谏官之职、重视经筵的原因。英宗即位后，一度停开经筵，司马光坚决主张恢复，请吕公著等人进讲《论语》和《史记》。

在德才关系上，司马光一向以德为先，认为德是最重要的；在人才选拔上，强调以德统才。早在庆历四年（1044）就写了《才德论》，后来在《资治通鉴》开卷论智伯之亡时，又特别发论，用历史事例说明在人才选拔上德的重要性。

司马光重视国计民生，主张通过轻徭薄赋、节俭用度、备粮救荒、避免战争等措施来养民安民。司马光的儒家政治思想和治国主张，也突出地反映在《资治通鉴》的附论部分。

《资治通鉴》的史学成就与历史价值

1. 史学成就

《资治通鉴》在继承前代史学传统的基础上，在历史编纂学、史料学、历史考据学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显示出宋代史学发展的活力与创新精神。

（1）《资治通鉴》的编纂具有一整套严密合理的工作制度与方法，为这部编年体巨著达到空前的学术水平提供了重要保证。

1）主编全面负责的集体分工合作制。治平三年（1066）书局成立时，英宗同意司马光自选助手。司马光陆续选择了刘恕、刘攽和范祖禹三人为协修官，把当时最优秀的史学人才聚拢到《资治通鉴》的写作班子中。

刘恕（1032—1078），字道原，筠州高安（治今江西高安县）人。仁宗皇祐元年（1049），进士明经第一名。博闻强记，专精史学，“自太史公所记，下至周显德末，纪传之外至私记杂说，无所不览。上下数千载间，巨微之事，如指诸掌”。编纂中，

① 参见《资治通鉴》卷263《唐纪》七九，18册，8595页。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9，7册，4067页。